

研究近代東亞報刊史的一些初步想法*

潘 光哲

1898年春天的唐才常，正在長沙肩負編輯《湘報》的工作，那也正是大清帝國講求「變法」推動「新政」的熾熱時分。唐才常筆耕不輟，宣講世界大勢，為改革變法維新的時代風潮張目。有趣的是，觀察一下他的立論來源，實在是廣泛至極，令後世對探索他的思想世界的史學工作者驚異不置：僻處在長沙的唐才常，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尋書覓報，既擴張自己的思想資源，也強化了自己立論暢說的說服力¹？唐才常旁徵博引，聲言當時「湖南新政」的局面竟然廣受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本政教社創辦的《日本人》²裡的言論，就是他鼓動湖南同鄉的依據：

才常又見日人新出一報，名其端曰《日本人》（以日本人三字名報，甚奇），所言多中國事。其臚中國名大臣，則首督部張公、撫部陳公，稱陳公振湘政，尤津津不一二談，又從而幟之曰湖南黨。自餘則豔稱南海康工部門下諸君為獅子吼。於是湖南之名重五洲，泰西泰東則莫不引領望之，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氣，而可俠可仁者惟湖南。唐才常喟然而嘆曰：微日本言，吾幾忘吾湘人之大有為至於如此，吾幾忘吾湘人之受撫部賜與一時挾世君子恢張能力以存種教之功至於如此！……³。

* 本文為行政院國科會專題計畫：《「知識倉庫」、「思想資源」與「概念變遷」：晚清士人的閱讀世界【II】》（計畫編號：NSC92-2411-H-001-073）之部分成果，謹致謝忱。又，本文初稿發表於：大韓民國首爾：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主辦），「國民國家的近代性及其文化制度——以知識·學術·媒體·公論場為中心——」研討會（2006年7月5-7日）。與會期間承蒙成均館大學韓基亨教授的講評指教，復蒙吳炳守、車雄煥、尹海東、三谷博、孫江與章清諸學界前輩友朋糾謬攻錯，謹此特致謝悃。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¹ 關於研究唐才常汲取的知識與其思想之關聯的先驅文獻，可以參考：陳善偉，〈翻譯與政治：唐才常的西學知識與政治思想〉，《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9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9年），頁235-248。

² 關於政教社與《日本人》的專著研究，可以參考：中野目徹，《政教社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93）、佐藤能丸，《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研究——政教社の成立とその周辺》（東京：芙蓉書房，1998）。

³ 唐才常，〈論興亞義會〉，《湘報》第65號（1898年5月20日）；可是，目前還不知道唐才常徵引的《日本人》的言論，原來究竟出自《日本人》的那一篇文章（或報導）。

回到歷史的本來場景，可能正是政教社成員之一的佐藤宏以《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為中介，將《日本人》寄到《湘報》編輯部⁴，遂讓唐才常有機會讀而閱之，竟可讓他得以筆走龍蛇。然而，政教社以《日本人》為觸媒，和大清帝國治下投身於報刊事業的士人結交相聯，並不是日本報刊界偶一為之的罕見個例。當時比《湘報》發行量更大，影響更為廣闊的《時務報》，則儼然是幅輳所集，《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與日本報刊界聯絡，也是興致昂然。汪康年曾將《時務報》的縮印本寄給《大阪朝日新聞》，請其代售推廣，《大阪朝日新聞》也刊出介紹《時務報》的文稿，雙方儼然有意合作⁵；在近代日中關係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之團體「東亞同文會」，參與其創建工作的白岩龍平，既寄奉《日本人》給汪康年，也推動《中外時論》和《時務報》的交換工作，並在日本代售《時務報》⁶。汪康年與日本往來密切，以致友人如山本憲，為了報答獲贈《時務報》的友誼，甚至於主動投寄他閱讀《朝日新聞》的「摘譯」文稿⁷；當「東亞同文會」的機關報之一《亞東時報》在上海創刊（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本人則為之撰〈《亞東時報》敘〉⁸，表達支持之意；彼時方甫辭卸《湘報》編輯工作，離開長沙的唐才常，也參與了《亞東時報》的創辦工作，「為報務牽纏，幾無暇晷」⁹。

在汪康年、唐才常的個例之外，放寬我們的觀察視野，近現代中國報刊從日本取材者，報刊的從業者與日本有密切關係者，實不知凡幾。近現代中國存在時間最稱長久的大型綜合雜誌：《東方雜誌》，即是一例：

〈論歐洲外交之變遷（錄甲辰第三號外交報譯日本國民新聞）〉，《東方雜誌》，第1卷第3號（1904年5月10日）。

〈論日俄戰爭足以正政論之謬（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九月東方協會會報）〉，《東方雜誌》，第2卷第2號（1905年3月30日）。

至1910年代，依復如是，僅以1919年7月15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而言，便刊佈多篇譯稿：

⁴ 〈佐藤宏函（三）〉，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冊4，頁3326-3327。

⁵ 原文是：「貴報館之聲價，敝紙曩者紹介之於世，載在二月念三日紙上，若夫博售之，敝邦人使其隨時展讀，亦不為兩國聯合之端邪」，見：〈大阪朝日新聞函〉，《汪康年師友書札》，冊4，頁3289。

⁶ 〈白岩龍平函（一）〉、〈白岩龍平函（二）〉，《汪康年師友書札》，冊4，頁3319-3320。

⁷ 〈山本憲函（五）〉，《汪康年師友書札》，冊4，頁3296；山本憲投寄的文稿，應該是：山本憲，〈朝鮮辭俄國陸軍教習及度支部顧問官本末〉（附編／時務報館譯編續集），《時務報》，冊61（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1898年5月20日〕），景本冊5，總頁4153-4156；本文引用的《時務報》版本是：《強學報·時務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景印〕，全5冊）。

⁸ 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国：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理念とその実践》（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1），頁74。

⁹ 參見：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下冊，頁555。

高勞，〈美人及美國論（譯實業之日本）〉，《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年7月15日）。

善齋，〈西伯利亞政界之波瀾（譯東京日日新聞）〉，《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年7月15日）。

君實，〈俄國過激派統治之內容（譯日本太陽雜誌）〉，《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年7月15日）。

君實，〈產業組織之統一主義（譯日本新時代雜誌）〉，《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年7月15日）。

至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報界擁有獨特地位的《大公報》，自1902年6月17日創刊初始，也屢屢利用日本報刊的資料，提供關於世界大勢的新聞資訊。以1902年7月16日《大公報》的「譯件」部分為例，刊載14則新聞，來自日本報刊的資訊即達8則，分別取材於日本的《大阪朝日新聞》（2則）、《國民新聞》（3則）、《萬朝報》（3則）；1902年9月3日《大公報》的「譯件」，刊載13則新聞，7則取自日本的《東京日日新聞》。下逮「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代表刊物之一的《新青年》，也刊有直接譯自日本報刊的文稿，例如：

桑原隲藏（作），J. H. C生（譯），〈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¹⁰。

《新青年》引介的「新思潮」，也泉源於日本的報刊。如李大釗的〈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第6卷第2號（1919年2月15日），基本上便是山川菊榮的〈一九一八年と世界の婦人〉（原刊日本《中外》1919年2月號）之翻譯¹¹。即使是學生輩創辦的刊物如《新潮》，刊佈之文稿，亦有取材於日本報刊者，如：

譚鳴謙，〈勞働問題之解決（譯自日本太陽雜誌）〉，《新潮》第1卷第4號（1919年4月1日），頁601-609。

至於同一時期努力圖謀革命事業之再起的國民黨人，也重行步上接觸馬克思／社會主義思潮的衢道¹²，來自日本的書籍報刊，則猶如指向南針一般，如戴季陶主編的《星期評論》刊載這個主題的文章，參照《新社會》、《批評》、《社會主義研究》、《改造》等日語雜誌新聞而寫成者，更是繁多難數¹³。其他例證亦多，不再一一詳舉。凡此可見，報刊雜誌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時代」裡，固然扮演了獨特而且影響深遠的角色，既是新聞資訊的傳遞者，也引介了各式

¹⁰ 按，原稿註記：本文原見日本《太陽》雜誌，1917年3月號；經查，本文即：桑原隲藏，〈支那學研究者の任務〉，原刊：《太陽》雜誌，第23卷第3號（1917年3月），收入：《桑原隲藏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68），冊1，頁589-606。

¹¹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44。

¹² 關於國民黨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重行接觸馬克思主義及其他社會主義思潮的一般狀況，參見：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66-322。

¹³ 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56-57。

各樣的新思想，刺激帶動了政治社會意識的變遷¹⁴。可是，仔細分疏，日本則好似「看不見的手」，提供了相當的動力來源。因此，如果能夠注意報刊雜誌上的各式文獻的取材依據，顯然會深化我們對這個「轉型時代」的認識與理解。

二

當然，報刊雜誌上刊佈的文獻是一回事，讀者開展自身的獨特知識汲取之旅，並做出千樣萬態的回應是另一回事。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等，以日人著述或報刊為立論之依傍，研究既多，世所眾知矣¹⁵，關於《清議報》或《新民叢報》引發的讀者迴響，則還有待學界細細考查。以當時積極追求新知而聲名並非稱顯赫的孫寶瑄為例，他看到了《新民叢報》後，即認為梁啟超「學識」大有進步，所以這分刊物的議論「較前尤持平」¹⁶，即使他的朋友夏堅仲自日本游歷歸來，告訴他說《新民叢報》上讓中國人「讀之聳目驚心」的「新理」雖然連篇累幅，實皆拾取日本的「唾餘」，不足與之比肩¹⁷，然而，《新民叢報》仍是孫寶瑄不

¹⁴ 張灝指陳，從1895年至1920年初前後大約二十五年的時間，可名之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那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啓後的關鍵時代，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領域方面，也展現了突破性的巨變，報刊雜誌做為「制度性傳播媒介」的表現之一，不但報導國內外的新聞，並具介紹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會意識的作用，影響深遠，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收入：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37-60。

¹⁵ 關於梁啟超如何透過日本報刊思想界汲取「思想資源」，參見：狹間直樹（編），《共同研究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本書有漢譯本：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亦可參見：Joshua A. Fogel, edited, *The Role of Japan in Liang Qichao'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China*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鄭匡民，《梁啟超啓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關於研討梁啟超與日本思想之關係的檢討，參見：崔志海，〈梁啟超與日本：學術回顧與展望〉，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15-129。

¹⁶ 原文是：「梁卓如改《清議報》為《新民叢報》，議論較前尤持平，蓋年來學識之進步也」，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二月二十日（1902年3月29日）日記」，氏著，《忘山廬日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580，頁299；另，參考本書排印本：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492（因《續修四庫全書》為原稿影印本，而排印本頗有錯漏，故本文徵引，悉據《續修四庫全書》本，另參考排印本；至於後者錯漏之處，不詳一一覈校）。

¹⁷ 原文是：「梁任公《新民叢報》，新理盈篇累幅，我國人讀之聳目驚心，而自日人觀之，皆唾餘也，其程度相去懸遠」，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六月廿六日（1902年7月30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580，頁378；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549。

可或缺的「精神糧食」之一¹⁸，他亦對梁啓超在日本「播騰」的「閔言偉論」，以及在中國「文字之中，闢無窮新世界」的功力，佩服之至，推崇為與袁世凱、盛宣懷足可同稱並立的當代「奇人」¹⁹。梁啓超影響所及，更還擴張到朝鮮半島，不少著作都被譯為韓語²⁰。

日本的報刊對中國影響深遠，韓國方面，應該亦復如是。如在福澤諭吉的牽線推動下，井上角五郎對協助《漢城旬報》之創辦（1883年），就是發人興味的問題²¹；韓國報刊對大清帝國局勢之觀察述說，也反映了多重涵意，如由獨立協會創辦的《獨立新聞》（1896年4月創刊），對大清帝國「戊戌變法」景象及其失敗的報導和評論，便具體反映朝鮮之「自我認識」的一個側面²²。

就十九世紀以來變動無已的東亞世界而言，媒體報刊領域呈現出中、日、韓之間的互動樣態，自是多樣複雜。意欲開展探研之路，如何借鑒既有成果的積累，當可為持續前行，提供無限的動力根源。

¹⁸ 如孫寶瑄讀了梁啓超發表在《新民叢報》上的〈新史學〉，雖覺梁啓超對於中國「舊史之弊」的論議「有未安之處，一時亦無以難之也」，但對梁啓超稱譽司馬遷等六位史學家「有創作之才」，則認為「頗允當」，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七月八日（1902年8月12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580，頁383-384；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553；至於孫寶瑄閱讀《新民叢報》的其餘心得，不詳一一引述。

¹⁹ 原文是：「今日支那有三大奇人：其一曰袁世凱。……其一曰盛宣懷。……其一曰梁啓超。梁一區區書生，當甲午、乙未之交，不過康門小徒耳。自充《時務報》主筆，議論風行，名震大江南北。戊戌政變，康、梁並出走，朝廷降懸賞名捕之諭，幾于通國人民皆聞其名，莫不震動而注視焉。然康自是匿跡銷聲，蜷伏海外；梁則棲身東島，高樹一幟，日積其怨氣熱腸，化為閔言偉論，騰播於黃海內外、亞東三國之間，無論其所言為精為癡，為正為偏，而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啓超，非奇人而何？梁能於我國文字之中，闢無窮新世界，余故服之」，見：孫寶瑄，「光緒廿八年八月一日（1902年9月2日）日記」，《忘山廬日記》，《續修四庫全書》，冊580，頁397；參考：《忘山廬日記》（排印本），頁563；這番話應是孫寶瑄與嚴復（又陵）的談話心得。

²⁰ 相關研究，如：佐佐充昭，〈韓末における「強權」的社会進化論の展開——梁啓超と朝鮮愛國啓蒙運動——〉，《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40期（東京：綠蔭書房，2002年10月），頁183-213（本文列表說明梁啓超著述被譯為韓文的情況，尤為充實）；另可參考：鄒振環，〈清末亡國史「編譯熱」與梁啓超的朝鮮亡國史研究〉，收入：《韓國研究論叢》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頁325-355。

²¹ 參見：金鳳珍，〈朝鮮の開化と井上角五郎——日韓關係史の『脱構築』を促す問題提起〉，《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40（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頁453-474；另，金鳳珍，〈朝鮮の開化初期新聞に関する一考察〉，《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86（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1996年3月），尚未見。

²² 參見：月脚達彦，〈『独立新聞』における「自主独立」と「東洋」——近代朝鮮におけるアジアと脱亜〉，收入：渡辺浩、朴忠錫（編），《韓国・日本・「西洋」：その交錯と思想変容》（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5），頁303-331。

三

「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就借鑒既有成果來說，筆者所知，日本學界對於媒體報刊之研究，成果豐富，如小野秀雄、西田長壽等，皆有引路之功²³，傳承相衍，更是推陳出新。像是在所謂「大眾社會」的背景下，解析新聞報刊如何藉著舉辦猜測誰是「大相撲優勝力士」、誰會當選民意代表的「予選投票」等「懸賞」活動而吸引讀者的因應之道，展現媒體和「國民的大眾化」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²⁴；又如研究讀者對報刊的回應互動，向來是報刊史研究的重要主題，卻也往往因資料欠缺，頗有難點。山本武利則廣輯史料，分析日本各階層對各種報刊的回應，甚至於包括軍隊士兵在內，展現報刊如何爲滿足前線士兵的對思鄉之情而特闢地方新聞的場景²⁵；永嶺重敏析論日本報刊雜誌的讀者群，視野所及，則注意地方上的學校教員如何形成了「讀者共同體」的樣態²⁶。報刊創辦者及其事業，亦有細密的勾勒，有山輝雄對於一代言論鉅子德富蘇峰創辦《國民新聞》的歷程及其言論變化的趨勢²⁷，便是一例；對個別的重要報刊進行精緻研究的成果，亦不乏見。例如，鈴木貞美編輯以《太陽》雜誌爲探討對象之文集，收文22篇，舉凡《太陽》雜誌之整體沿革歷史，其出版者博文館與其主要編者的情況，《太陽》雜誌涵括之重要論題（如「中國觀」、「教科書問題」、「翻譯文學」之介紹、「婦女問題」等），皆有涉及²⁸；又如，後藤孝夫以《大阪朝日新聞》之「社說」涉及「日中關係」者爲中心，檢證日本言論界自身糾纏於「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思想樣態²⁹。筆者涉讀之後，

²³ 日本學界對於媒體報刊之研究，成果豐碩，個人涉讀所及，整理諸等相關課題的通論之作是：有山輝雄、竹山昭子（編），《メディア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東京：世界思想社，2004）；新近更擴張研究視野，檢討媒體報刊和日本帝國之間的知識關聯，參見：山本武利（責任編集），《メディアのなかの「帝国」》，《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卷4（東京：岩波書店，2006）；山室信一則從媒體和「國民國家」的形成面向，開展研究史的檢討，見：山室信一，〈国民国家形成期の言論とメディア〉，收入：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校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1・言論とメディア》（東京：岩波書店，1990），頁477-540；對於「綜合雜誌」從明治到大正時期的變化述說，參見：飯田泰三，〈大正期の總合雜誌と「文明批評家」たち〉，收入：佐藤秀夫、山本武利（編），《日本の近・現代史と歴史教育》（東京：富士製本株式會社，1996），頁74-94；James L. Huffman對研究明治時期的報業（亦稍涉及出版業）之日英語文獻，亦略有討論回顧，見：James L. Huffman, *Creating a Public: People and Press in Meiji Japan*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1-11（其餘日英語文獻，不詳舉例）。

²⁴ 奧武則，《大衆新聞と国民国家：人気投票・慈善・スキャンダル》（東京：平凡社，2000）。

²⁵ 山本武利，《近代日本の新聞読者層》（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

²⁶ 永嶺重敏，《雑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2004）。

²⁷ 有山輝雄，《德富蘇峰と国民新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

²⁸ 鈴木貞美（編），《雑誌『太陽』と国民文化の形成》（京都：思文閣，2001）；類似取向者，如：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編），《『明六雑誌』とその周辺：西洋文化の受容・思想と言語》（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4），因個人工作之中研院院內各圖書館皆未收藏，尙未之見。

²⁹ 後藤孝夫，《辛亥革命から満州事変へ：大阪朝日新聞と近代中国》（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

頗得啓示，受益甚眾。

就西方例證而言，報刊／媒體的文化史研究，提煉之議題，觀照之領域，更是粲然可觀，更屢屢形成似可概括人類歷史經驗的宏大理論。如法國學界從文化史角度觀察法國大革命，媒體即成爲重要的觀察對象，各式各樣的論著層出不窮³⁰；研究閱讀出版史之名家Roger Chartier即強調，研究者不能只是注意所謂的文本，還要重視讀者群（從歷史的與社會的角度）接近／取得這些文本的途徑，沒有物質條件的支持，讀者（或聽眾）不可能接近文本，閱讀文本的過程和它如何爲讀者得到的形式，自是密切相關³¹。他的述說，提示我們應該注意報刊和資訊之生產流通過程的物質條件／基礎，發人深省。

例如，新聞消息的傳遞速度，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實是息息相關。以大英帝國爲例，1850年代從不列顛本島到澳洲的新聞傳播，要三個月之久；即使後來到了1860年代使用蒸汽輪船了，兩地之間，仍需45天³²。不過，在1850年時，英、法之間首先搭起了海底電纜，由此際起，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此後十年，更建立了海底電纜的環球體系。就大英帝國而言，這項工程大大改變了帝國的核心與邊陲之間的空間關係（the spatial relationship），各式各樣的資訊，可以在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裏散播開來，讓人們可以想像自己就是某個國族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的成員，維繫了帝國認同。即時的新聞，讓那些即便是出生成長生活於帝國領地（the Dominions）的人，也會覺得自己同各種帝國事務與政治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³³。以日本而言，電信事業做爲「社會基盤」（infrastructure），既提供了經濟活動裡迅速傳達情報的效果³⁴，也讓日本新聞媒體可以廣爲利用³⁵，甚至於在1877年「西南戰爭」的新聞報導戰裡，電信更是大起作用³⁶。那麼，在中國、韓國的相關場景例證，又是如何？顯然值得追索。就筆者所知，1910年長沙「搶米暴動」的訊息如何迅即傳達出去，致使清廷得以發動鎮壓的整體歷程，石川禎浩做出了生動細膩的考察³⁷；謝俊美則分疏武昌起事後革命黨人如何利用電報傳遞訊息，

³⁰ 評論之作，可見：Jeremy D. Popkin, "The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 (1990), pp. 664-683。

³¹ Roger Chartier, "The World as Representation", in Lynn Hunt, and Jacques Revel, eds., *Histories: French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pp. 550-551。

³² 參見：Simon J. Potter,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 The Emergence of an Imperial Press System, 1876-19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7。

³³ 參見：Simon J. Potter, *News and the British World*, p. 28。

³⁴ 參見：藤井信幸，〈明治前期における電報の地域的利用狀況——近代日本と地域情報化——〉，《近代日本研究》，第12期，1990年，頁138-156。

³⁵ 參見：里見脩，〈通信社の發達——國內通信から國通信への模索——〉，收入：有山輝雄、竹山昭子（編），《メディア史を学ぶ人のために》，頁139。

³⁶ 參見：石井寬治，〈情報・通信の近代史：近代日本の情報化と市場化〉（東京：有斐閣，1994），頁108-109。

³⁷ 石川禎浩，〈長沙大搶米的“鎮壓”與電信〉，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4），上冊，頁

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動力之一³⁸，便都是以獨特觀察視野研究「辛亥革命」歷程的罕見之作³⁹。

西方學界的既有成果，亦可刺激吾人的研討向度。以歐洲而言，不同國家的政治／法律架構，就對出版業的活動範圍與可能性，帶來不同的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亦復如是。然而，研究者還是可以異中求同，設定某些共同的議題，以求得我們對報刊的出版史／文化史的多元認知。例如，就報紙而言，可以追索：誰擁有報紙（誰是報紙的老闆）？為它們寫作的是那些人？報紙如何流傳？讀者是那些人？至若報紙的售價、出版週期、市場行銷方式與普及程度，既決定了它可以滲透的地域和社會層級，也決定了它們能否從背後的贊助者與社會力量獨立出來的程度。每個國家／地區的情況，各有差異，探索其獨特的歷史經驗，應可對於各種關於出版文化的概括論斷（generalizations），提出愈形深入的反思⁴⁰。

在報刊／媒體研究的宏大理論方面，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論題，更激發了相關學術研究的勃興。除了歐美各國以自身獨特歷史經驗而開展檢討思索之外⁴¹，其他地區的反思探索，亦頗有可堪借鑒之處。如日本的三谷博以創刊於1875年而於翌年慘遭官方依據《太政官布告》第98號遂被封禁的《評論新聞》為分析對象，釋論日本的「公論空間」⁴²；又如印度史方面，Veena Naregal則（主要以語言和文學領域）探討在大英帝國統治下接受英語和印度自身語言雙語的西印度菁英，如何建構出「殖民的公共領域」（colonial public sphere）⁴³。至如在中國史研究脈絡言之，導入「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概念以開展者固眾，

503-519。

³⁸ 謝俊美，〈情報傳達と辛亥革命——盛宣懷と中國電報局をあわせて論ず——〉，收入：孫文研究会（編），《辛亥革命の多元構造——辛亥革命90周年国際學術討論會（神戸）——》（東京：汲古書院，2003），頁70-89。

³⁹ 千葉正史也注意到電報對晚清政治局勢／政府體制的影響，參見：千葉正史，〈情報革命と義和團事件—電気通信の出現と清末中国政治の変容—〉，《史学雑誌》，108編1號（1999年1月）、千葉正史，〈清末における電奏・電寄論旨制度の成立—清朝政治体制への電気通信導入をめぐる—〉，《東洋史研究》，第64卷第4号（2006年3月）。

⁴⁰ Hannah Barker and Simon Burrows edited, *Press, Politic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1760-18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本書收文10篇，分別就荷蘭、德意志、英國、愛爾蘭等歐美國家／地區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際的情況，分而述之。

⁴¹ 例如：Jon Cowans, "Habermas and French History: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French History*, Vol. 13 (June 1999), pp. 134-160（不詳舉例）。

⁴² 見：三谷博，〈公論空間の創發——草創期の「評論新聞」——〉，收入：鳥海靖、三谷博、西川誠、矢野信幸（編），《日本立憲政治の形成と變質》（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58-85；三谷博還另編輯以討論以日、中、朝鮮為主的「東亞公論」的形成及其歷史經驗的文集：三谷博（編），《東アジアの公論形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

⁴³ Veena Naregal, *Language, Politics, Elites and the Public Sphere: Western India under Colonialism* (London: Anthem, 2002)。

辯駁亦多⁴⁴；跳脫了既存「新聞史」的研究格局，以具體的報刊研究進行討論的成果⁴⁵，也陸續出現。總之，關於人類社會裡的「公共空間」或「公共領域」的歷史經驗與理論議題，顯然已蔚為學術產業。

可是，即令從文化史角度，或是借鑒於Jürgen Habermas的論題，開展報刊史的探討，不應離事而言理。如何從具體的史料蒐集與解讀等步驟出發，以比較精細的個案討論取向，「見微知著」，藉以做為認識歷史的變化趨向的根底，實為史學工作者無可旁貸之本來任務。如前述《大阪朝日新聞》刊出介紹《時務報》的文稿，台灣方面未藏有《大阪朝日新聞》（或微卷），想查覈這篇介紹《時務報》的文稿，尚無其門。又如，白岩龍平與《時務報》方面的往來，筆者雖知悉白岩龍平的日記已然問世⁴⁶，台灣卻無任何圖書館收藏是書，無從考查。想要精確述說這一段媒體互動的歷史本來面貌，目前實幾無可能。在台灣的筆者，意欲研討這段「互動」的歷史，顯然得仰賴日本學界友朋的「互動」之助⁴⁷。

四

總結而論，我們以報刊為研究對象之際，如果能夠放寬知識視界，從近代東亞世界彼此交纏繞結的整體場景出發，廣涉史籍，交互參照相關資料文獻，必能對近代東亞文化思想之互動、交流和影響的歷史，別出新見，拓展更為寬廣的認識空間。

在筆者看來，開展之道，實應奉朱熹「小作課程，大施工力」為典則，進行精細的個案研

⁴⁴ 參看：孔復禮（Philip Kuhn），李孝悌、沈松橋（譯），〈公民社會及體制的發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3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3月），頁77-84、陳永明，〈「公共空間」及「公民社會」——北美中國社會史的辯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11月），頁90-97（不詳舉例）。

⁴⁵ 如：Rudolf G. Wagner,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1: 1, pp. 1-34、Barbara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不詳舉例。

⁴⁶ 中村義，《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東京：研文出版，1999）。

⁴⁷ 當然，從日本的角度來說，日本報刊也必然會揭載取材中國報刊的訊息。例如，宋恕在1892年上書李鴻章（即：宋恕，〈上李中堂書（1892年5月30日）〉，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上冊，頁498-504），後來刊佈於《萬國公報》（即：瑞安宋存禮，〈上合肥傅相書〉，《萬國公報》〔月刊〕，第101卷，光緒廿三年五月〔1897年6月〕，台北華文書局景本，冊27，總頁16929-16935），日本的《東邦協會會報》應當即依據《萬國公報》刊本，逐譯刊之：（浙江）宋存禮，〈上李鴻章書〉，《東邦協會會報》第38號（東京：明治30年9月），頁56-63（文前並附有編者識語，略言曰是文雖撰於甲午之役以前，卻可視為戰後「支那人士悔悟自奮之狀」的具體表徵之一，故刊佈於是刊，以供「參替」）；其餘例證，不一一詳舉。因是，日本方面如何擷取中國媒體提供的情報訊息，日本學界友朋應可仰仗地利之便，開展更為精密的研究述說。

究工作；那種「一口飲盡西江水」的信筆潑墨，基本上沒有生存的空間，始可展現具體的知識成果。以既有成果為借鑒，筆者淺見認為，努力之道，或可略分為下述諸衢：

①就某分報刊對於近代東亞世界的某一課題之報導和述說為對象，進行詳縝的分析討論⁴⁸。

亦或②全面整理某位歷史人物在個別報刊上對於近代東亞世界的某一課題之言論⁴⁹。

亦或③對某一報刊及其出版者、編者之關聯，進行整體歷史重建的精密研究⁵⁰。

甚或④地毯式地整理、纂輯某分報刊涵括之語彙或概念辭彙（乃至刊行「復刻本」）⁵¹。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如能承繼學界之創獲，後繼者必然可以創造出獨特的知識貢獻。

當然，入手之方無窮，著眼之道無限，端賴知識生產者自身的巧思妙想。至於如何集眾合作，為共同深拓人類的知識板塊與智慧空間，各盡心力，則有待於同志。本文之作，「野人獻曝」，希望稍具這樣的提醒作用。

⁴⁸ 略舉其例：土屋礼子，〈明治七年台灣出兵の報道について——「東京日日新聞」を中心に——〉，收入：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211-235、井口和起，〈『東洋經濟新報』の植民政策論—1910年代の朝鮮政策論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氏著，《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會，2000），頁244-277。

⁴⁹ 略舉其例：井田進也，〈二〇〇一年の福沢諭吉—清仏戦争期『時事新報』論説の再検討—〉，《近代日本研究》，第17卷（東京：慶應義塾福澤研究センター，2001年3月），頁45-68、李向英，〈陸羯南の對清認識—日清提攜論から支那保全論へ—〉，《史學研究》，第243號（2004年1月），頁21-41。

⁵⁰ 略舉其例：山口昌男，〈明治出版界の光與闇：博文館の興亡〉，收入：氏著，《「敗者」の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95），頁219-251、杉原四郎、岡田和喜（編），《田口卯吉と東京經濟雜誌》（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95）。

⁵¹ 筆者所見，關西大学内田慶市與沈國威教授等組織之工作團隊，於此致力尤勤，貢獻厥偉，參見：沈國威（編著），《『六合叢談』(1857-58)の学際的研究》（東京：白帝社，1999）、沈國威、内田慶市（編著），《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智環啓蒙塾課初歩』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学出版部，2002）、沈國威、松浦章、内田慶市（編著），《遐邇貫珍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学出版部，2004）。